

“文明冲突”,还是种族主义?

——试析法国政府的穆斯林移民政策

魏秀春

内容提要 自20世纪60年代北非穆斯林大规模移民到法国以来,法国政府坚持以“共和模式”为标志的移民政策,促使穆斯林移民完全融入法国社会。然而,由于经常与穆斯林移民的宗教活动和宗教习俗“纠缠不休”,“共和模式”成为穆斯林移民融入法国社会的“瓶颈”;与此同时,法国社会对穆斯林移民及其后代的歧视与偏见,使得“共和模式”面临破产的境地。在新的形势下,法国的“共和模式”和穆斯林移民政策应该与时俱进。

关键词 法国 穆斯林 移民政策 “共和模式” 种族主义

2005年10月27日晚在巴黎北部郊区的克利希苏布瓦市,两名非洲裔穆斯林少年为躲避警察追捕而触电身亡。次日,该镇数百名青少年走上街头抗议,焚烧汽车和垃圾桶,打砸店铺和政府机关,并与警方发生冲突,引发严重的社会骚乱。可以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样的城市骚乱在法国不断地上演。然而,这次城市骚乱却从巴黎迅速蔓延至全国和部分邻国,是数十年来法国最严重的骚乱。

长期以来,穆斯林移民问题受到了法国国内外舆论及专家、学者的严重关注和热烈讨论。这次骚乱发生在有大量北非穆斯林移民的社区,凸显了那里的移民对自身正在被边缘化、被割裂于社会繁荣之外的不满。目前,除了一些简介性的文章外,我国学术界很少有专文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介绍和讨论。本文将从法国穆斯林移民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探讨法国政府的穆斯林移民政策。

一、法国穆斯林移民的历史与现状

法国是西方国家中接纳穆斯林移民最早和最多的国家之一。由于法国的法律禁止进行各种基于宗教与种族的数据统计,故无法获得更精确的数字。一般认为,法国有400万—500万穆斯林,几乎是法国总人口的1/10,其中近一半的人已是法国公民。在这个以天主教徒为主的国家里,穆斯林的人数已经超过了新教徒和犹太教徒,伊斯兰教已经成为法国的第二大宗教。法国穆斯林绝大多数是来自法国前北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统称马格里布地区)的移民及其后代,而来自西非国家、土耳其、印度次大陆的穆斯林移民只占很小一部分。据统计,2000年时法国穆斯林居民的原籍构成如下:阿尔及利亚裔为155万人,摩洛哥裔为100万人,突尼斯裔为35万人,黑非洲裔为25万人,土耳其裔为31.5万人,亚洲裔为

10万人,皈依者为4万人,难民或非法移民为35万人。

20世纪以来,大量的外来移民特别是来自法国前北非殖民地的穆斯林移民涌入法国。穆斯林移民到法国的原因可以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阿尔及利亚士兵在一战中的贡献,法国当局欢迎他们移居法国。二战后初期,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采取了特殊的政策,取消了对阿尔及利亚人进入法国的种种限制,阿尔及利亚人可以自由进入法国并享有公民待遇。大批穆斯林的到来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结束后,在战争中支持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无法继续呆在国内,法国当局允许他们随法军一同撤回法国,为其提供庇护。马格里布三国独立后,作为法国前殖民地的臣民,三国的居民仍然可以自由进入前宗主国。同时,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补充劳动力的巨大缺口,法国政府从北非等前殖民地招募了大量移民劳动力。这样,20世纪60—70年代,法国的穆斯林移民数量直线上升。1962—1968年间,来自马格里布地区的移民从41万人上升到61.9万人,平均每年约增加3.5万人;1968—1975年,平均每年有70万名穆斯林进入法国。

1973—1974年,西方石油危机结束了二战后西方工业的迅速扩张,法国经济发展的“辉煌三十年”也随之终止了。为克服经济危机和缓解失业压力,法国开始限制移民进入。至德斯坦总统执政时,法国当局完全摒弃自由移民政策。1974年7月法国当局宣布暂时禁止外国劳工入境,并中止外籍工人家庭的“团聚”。1975年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推翻了政府的决定,继续允许移民家庭的团聚。随后,法国政府便以提供巨额补偿金为条件鼓励移民返回母国,但收效不大。由于担心以后不能再回到法国,绝大多数移民工人选择留在法国。当时在法国境内的100多万名马格里布移民中,只有约10万人返回了母国。

由于受到法国当局的种种限制,1975年后来自马格里布地区的移民数量跌落至每年4.3万人左右。然而,由于高出生率和非法入境,以及法国政府为家庭团聚而实行的特别政策,法国穆斯林的人数在20世纪90年代后仍然持续增长,1989年法国的马格里布移民总数达141.6万人,到1995年上升至190万人。目前,几乎所有的法国城镇中都有穆斯林居民。根据法国国内政部的文件,法国的穆斯林人口主要分布在以下地区:巴黎及其所属地区(占38%),马赛、尼斯和利维拉地区(占13%),里昂和格勒诺布尔地区(占10%),里尔地区(占5%)。20世纪80年代,以马格里布阿拉伯人为主体的穆斯林移民已成为进入法国的最大移民群体。

二、“共和模式”的困境

从历史、文化和传统上看,法国在西方国家中不仅是接纳移民最早和最多的国家之一,也属于对移民较为宽容的国家。对于移民,法国政府一贯坚持以“共和模式”为标志的移民政策,强调外来文化与法兰西文化的融合。这一政策是建立在共和、世俗和平等公民资格基础之

参见 Jonathan Laurence, “Islam in France”, U. S. - France Analysis, December 2001.

参见 Letitia Creamean, “Membership of Foreigners: Algerians in France”, in *Arab Studies Quarterly*, Winter 1996, vol 18 Issue 1, p. 51.

参见李明欢、法卡琳娜·盖哈西莫夫:《“共和模式”的困境——法国移民政策研究》,载《欧洲研究》,2003年第4期,第119—139页。

参见 Ronald Koven, “Muslim immigrants and French nationalists”, in *Society*, May/June 1992, vol 29 Issue 4, p. 26.

参见 Letitia Creamean, “Membership of Foreigners: Algerians in France”, in *Arab Studies Quarterly*, Winter 1996, vol 18 Issue 1, p. 51.

参见 Michel Gurfinkiel, “Islam in France: The French Way of Life Is in Danger”, in *Middle East Quarterly*, March 1997, pp. 19 - 30.

上的,旨在平等地对待外国移民,使其完全融入法国社会。因此,承认穆斯林移民社团的合法性,促使穆斯林群体完全融入法国社会,是法国当局重要的社会政策。法国的这一政策显然不同于英国和德国:“德国的政策是遣返穆斯林移民,英国则忽视他们的存在,只有法国采取积极措施促使其融入社会。”

实际上,上述政策并非是从穆斯林移居法国之初就开始的。在1989年之前,法国政府“容忍阿尔及利亚、沙特阿拉伯、摩洛哥、利比亚等穆斯林国家和跨国组织世界穆斯林团(MW I)等资助与支配法国境内的穆斯林社团,“消极地包容穆斯林基本的宗教活动与习惯;政府的政策往往受“实用主义、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特别是与阿拉伯世界的贸易关系和外交策略”的影响。1989年后,法国政府的政策才趋于明朗,逐步把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纳入国内政教关系的框架,法国当局才真正地以实现穆斯林与法国社会的一体化作为主要政策。明显的变化是,法国政府开始干预境内穆斯林的宗教活动与习惯。一个突出的例子是里昂清真寺的建设。经过长达十余年的争论,直到里昂的穆斯林社团最终同意降低清真寺尖塔的高度和搁置每天五次召唤信徒祈祷的传统做法,法国当局才准予这座由沙特阿拉伯资助的清真寺开工建设。在1994年9月的竣工典礼上,该寺的阿訇称其是“可兰经教义与笛卡儿(法国政治家和哲学家)智慧相结合的产物”。代表政府出席典礼的法国内政部长帕斯格瓦宣称,法国坚决不会将自身的共和传统与任何宗教相妥协,法国的穆斯林必须将共和国的法律置于伊斯兰教教法之上。“只讲法国国内存在伊斯兰教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它必须是‘法国的伊斯兰教。’”

为了塑造“法国伊斯兰教”,法国政府努力推动建立一个能够代表全法穆斯林的伊斯兰机构。长期以来,许多穆斯林社团各自为战,独自处理与法国政府间的关系,这使得法国当局很难从整体上与穆斯林社团进行对话。法国当局曾经试图以巴黎大清真寺作为全法穆斯林的代
表,却遭到其他穆斯林社团的反对,因为该清真寺主要受阿尔及利亚政府资助,阿訇也是由其任命。所以,法国政府在设法使穆斯林社团的资金来源多样化的同时,积极筹组由法国当局支配的全国性穆斯林组织。“9·11事件促使法国政府加快了这一进程。在时任内政部长萨尔克奇的努力下,“全法穆斯林理事会”(CFCM)和25个地区理事会(CRCM)于2003年4—6月相继完成了代表选举。在当选的代表中,大部分来自“穆斯林全法联合会”(UO IF)和“法国伊斯兰同盟”(FNMF)。统一伊斯兰机构的组建无可置疑地对法国当局与穆斯林的对话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法国穆斯林亦对它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民意测验表明,有81%的穆斯林认为“全法穆斯林理事会”足以代表全法的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有74%的人认为“全法穆斯林理事会”有助于解决穆斯林在斋月、祭杀动物、麦加朝拜、阿訇培训、清真寺建设等宗教活动上的困难。然而,法国当局的初衷并不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基于自身的利益将“全法穆斯林理

参见马胜利:《“共和同化原则”面临挑战——法国的移民问题》,载《欧洲研究》,2003年第3期,第105—118页;李明欢、法卡琳娜·盖哈西莫夫:《“共和模式”的困境——法国移民政策研究》,载《欧洲研究》,2003年第4期。

Milton Viorst, “The Muslims of France”, in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6, No. 5, p. 78.

Jonathan Laurence, “From the Élysée Salon to the Table of the Republic: State - Islam Relation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Muslims in France”, in *French Politics, Culture & Society*, vol 23, No. 1, Spring 2005, p. 39.

Milton Viorst, “The Muslims of France”, in *Foreign Affairs*, in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6, No. 5, p. 81.

同上。

参见 Jonathan Laurence, “From the Élysée Salon to the Table of the Republic: State - Islam Relation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Muslims in France”, in *French Politics, Culture & Society*, vol 23, No. 1, Spring 2005, p. 61.

事会 作为“缓冲器”,以平息国内穆斯林的各种不满情绪,更重要的是促进第二代和第三代穆斯林移民与法国社会的融合。

法国当局试图改造伊斯兰教的又一行动是制定“头巾法”。催生该法律的是法国社会对“头巾”(hijab)问题长达 10 余年的争论。1989 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日之后,在巴黎附近的一座小镇上,3 个十多岁的穆斯林女学生宣称她们是“伊斯兰教信徒而不是原教旨主义者”,坚持佩戴头巾。校方以头巾是宗教标志为由把她们开除了,因而引发了法国社会对“头巾”问题的政教之争。显然,1989 年“头巾事件”是一个转折点,直接导致了“头巾法”的出台。

2003 年 7 月,希拉克总统下令组建专家委员会,研究政教分离原则 是否在学校等公共机构中受到侵犯。该委员会向法国总统和议会提交的最终报告建议,在尊重宗教自由的前提下,应当禁止在公立学校展示任何宗教标志,因为法国的教育体制负有调和学生中各种宗教信仰的差异,灌输法国政教分离原则、共和主义和公民原则的使命。2004 年 2 月 10 日,法国国民议会以绝对多数(494-36)通过了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明显宗教标志的法案(俗称“头巾法”),同年 9 月 1 日参议院通过了该法案。穆斯林妇女的头巾被视为一种明显的宗教饰物,显然亦在禁止之列。该法律被通过后,遭到穆斯林团体的强烈抗议。一些穆斯林领袖认为,佩戴头巾被伊斯兰教女信徒视为一种宗教责任,强行禁止她们在公立学校佩戴头巾就等于阻止她们进入公立学校。“穆斯林全法联合会”要求游行示威,抵制“头巾法”,而“全法穆斯林理事会”的主要领导人则希望通过制度手段影响该法的“内容与适用”。显然,“全法穆斯林理事会”的领导人发现自身处于“穆斯林的锤子与法律的铁砧之间”而无所适从。尽管当时法国有关机构正在设法解救在伊拉克境内被绑架的两名法国记者,但法国当局仍拒不妥协,表示不会以牺牲价值观换取人质的获释,坚持将“头巾法”付诸实施。

至此,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使法国政府要强行制定一项法律禁止穆斯林女生在公立学校佩戴头巾呢?佩戴头巾虽是一个非常细小的社会习俗,却代表了穆斯林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深深地触及了伊斯兰文化的内核。然而,法国内政部官员认为在法国中学读书的 30 万穆斯林女生中,据估计有 15 万名女生佩戴头巾,这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示威。校方也宣称,是一些伊斯兰好战分子招募穆斯林女生佩戴头巾,并强迫其他同学也这样做。显然,在法国当局看来,穆斯林女学生佩戴头巾,是在现代世俗社会有意无意地传播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对法国公共机构的公然挑衅,有悖于 1905 年确立的政教分离原则。

笔者认为,“头巾法”实际上是法国当局坚持依照“共和模式”同化穆斯林群体的产物。与组“全法建穆斯林理事会”一样,法国当局的根本目的是试图以法国价值观改造国内的伊斯兰教,使其逐步实现本土化。法国当局相信“只有将伊斯兰教置于共和制度之下,消除其(传统的)思想,穆斯林才能与共和国而不是与其社团保持一致”。“共和模式”本质上是坚持文化的同质性和单一性。这种本质使它在实际操作中常常与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和诸如佩戴头巾等

所谓政教分离原则,即 Laïcité,其意义相当于英语中的“secularism”,是法国历史上国家与宗教长期斗争的产物,它从伏尔泰时代开始,一直到 1905 年明确地把宗教排除在所有国家机构之外时才得以确立下来,是法国的立国之本。

2004 年 8 月 20 日,两名法国记者在伊拉克遭到绑架,绑架者借此要挟法国政府撤销“头巾法”。经过多方努力,同年 12 月 21 日,两名人质安全获释。

参见 Milton Viorst, “The Muslims of France”, in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6, No. 5, p. 86.

Jonathan Laurence, “From the Élysée Salon to the Table of the Republic: State - Islam Relation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Muslims in France”, in *French Politics, Culture & Society*, vol 23, No. 1, Spring 2005, p. 42

宗教习俗纠缠不休。正如大革命时代克莱蒙特在辩论犹太人是否算作法国国民时所言:“我们必须拒绝犹太人作为国家的任何东西,但是我们应该接受作为个人的犹太人的任何东西。”事实上,法国政府顽固推行移民必须完全融入法国主流文化的政策,不但没有产生团结,反而孕育了分化和反作用,导致穆斯林移民的年轻一代更加坚定自身的宗教认同。正如一些分析家所认为的那样,“头巾法”名义上是在维护政教分离原则,实际上是间接地将反伊斯兰教和反阿拉伯的情绪合法化,与其说是阻止种族主义,还不如说是在放纵种族主义。可以说,“共和模式”恰恰是穆斯林移民融入法国主流社会的“瓶颈”。

三、种族歧视与偏见

基于同化外来移民的“共和模式”在第二代移民身上遭遇到了极大的挫折。第二代移民,即在法国出生或长大的穆斯林移民后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聚居在巴黎、里昂等大城市郊区犹如贫民窟一样的街区。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已经是法国公民,能说流利的法语,比较容易接受法国的主流文化,但他们却仍然不受法国主流社会的欢迎,而被排斥在社会、经济活动之外。他们的失业率远远高于其他移民和全国平均水平。据调查,在同等标准下,阿尔及利亚移民中持有中学文凭的、30岁以下的穆斯林青年的失业率是32%,而全法国的平均失业率为15%。由于长期处于失业状态或者被学校遗弃,移民青年的偷、打、砸、抢等违法活动屡见不鲜,有的甚至还从事贩毒、洗钱等犯罪活动,成为法国社会的“问题少年”。而且,他们也开始成为伊斯兰极端分子注意的对象。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一名阿尔及利亚裔移民青年(名为 Khaled Kelkal)的遭遇。他出生在阿尔及利亚,在法国长大。1990年,他父亲失业了。曾经是一位优秀学生的他,因为行窃而被捕入狱。获释后,他从来就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后来,他曾陪同母亲回到阿尔及利亚。法国警方认为,在阿尔及利亚期间伊斯兰极端分子招募了他。1995年8月,警察在里昂附近铁路旁的爆炸装置上发现了他的指纹,于是在全国通缉他。同年9月29日他被法国安全人员包围,由于拒不投降,在交火中被打死。在法国一家电视台摄制的录像中,一位警察猛踢他的尸体,另一位警察大声嚷着:“毁了他!毁了他!到达现场的阿尔及利亚籍移民认为警察的行为太过分了,他们激动地说:“他们把他像狗一样杀死了,对我们大家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警察的恶劣行径引起了穆斯林青年的愤慨。他们走上街头,焚烧汽车,哄抢商店,攻击警察,巴黎和里昂的郊区陷入一处混乱。如此规模的骚乱在法国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990年同样规模的骚乱首先在里昂郊区爆发,后来扩展到巴黎。最严重的莫过于本文开始时所述的骚乱。这场骚乱是法国自1968年学生运动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法国当局不得不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才使事件得以逐渐平息(“紧急状态”直至2006年1月4日才取消)。“紧急状态”始自1955年阿尔及利亚战争之初法国当局实行的旨在应对“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的一项法

Maillard Dominique, “The Muslims in France and the French Model of Integration”, in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Winter 2005, vol 16 Issue 1, p. 78.

参见 Kimberly Hamilton and Patrick Simon, *The Challenge of French Diversity*, 载 <http://www.migrationinformation.org/Profiles/display.cfm?id=266>。

参见 Jonathan Laurence, “From the Élysée Salon to the Table of the Republic: State - Islam Relation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Muslims in France”, in *French Politics*, p. 41.

Rachid Tlemçani, “Islam in France: The French Have Themselves to Blame”, in *The Middle East Quarterly*, March 1997.

律。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在巴黎实施过两次“紧急状态”。1984—1985年在法属海外领地新喀里多尼亚为了镇压当地人的独立运动也实施过“紧急状态”。为了平息2005年这场全国性的骚乱,同年11月15日法国当局不得不再次实施“紧急状态”,而且是在全国实施,足见这场骚乱对法国当局的冲击达到何种程度。

穆斯林青年的骚乱使法国“共和模式”的缺陷暴露无遗。尽管许多穆斯林非常努力,在艺术、体育方面取得了成功,有的人甚至进入法国政府机构,但大多数穆斯林移民仍处在法国社会的最底层,每天都在为生计而挣扎。缺乏必要的文凭和足够的技能固然是失业的重要因素,但社会歧视因素不可忽视。社会歧视与偏见在第二代穆斯林移民身上呈现严重化的趋势。他们陷入了“失业、种族歧视直至与警察冲突”的恶性循环中。“种族主义在共和国的许多地方公然推行着,以至于少数族裔公民仅因为黑色的皮肤或阿拉伯名字而失去工作和住房的权利,甚至于被剥夺进入娱乐场所的权利。”

笔者认为,法国穆斯林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法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反阿拉伯和反穆斯林的情绪。由这种情绪发展而来的种族歧视与偏见几乎使“共和模式”陷入破产的境地。导致这种状况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首先,穆斯林这一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体与法国社会文化传统之间隔着一道不易逾越的鸿沟,这是导致种族偏见的宗教与文化因素。20世纪60年代,由于穆斯林移民承担了大量在当地人眼里被视为最困难、肮脏、危险的工作,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因而穆斯林移民的宗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法国社会的尊重。然而,长期以来,法国社会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多为负面的。法国《世界报》的一项专门调查说明了这一点:60%的受访者将伊斯兰教与“暴力”相联系,66%的受访者认为伊斯兰教是“落后”的象征,71%的人认为伊斯兰教徒的“狂热行为”多于“宗教宽容”,更有高达76%的受访者认为伊斯兰教“压迫女性”。传统穆斯林社会的牺牲、多妻制等习俗更为普通法国人所不容。在拥有近500万穆斯林的法国,只有为数不多的清真寺。据统计,2003年全法国只有1554座清真寺、礼拜堂和祈祷室,且绝大多数是由地下室、店铺或仓库改建而成,设施简陋。但是,在建造清真寺问题上,1989年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只有33%受访者表示支持,而表示反对的达41%,说明法国社会上对此问题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

其次,法国对北非穆斯林的殖民统治和种族迫害是当今法国社会反阿拉伯情绪存在的历史原因。殖民化时期,北非穆斯林已经开始向法国移民,当时移民纯属向宗主国输出廉价劳动力,遭受着赤裸裸的歧视和迫害。20世纪以来,随着法国势力的衰落,法国的种族歧视有所淡化,穆斯林的地位有所改善。阿尔及利亚战争前后,法国的种族主义沉渣泛起,穆斯林移民特别是阿尔及利亚裔移民在法国的处境再度恶化。这段时间是法国种族主义极端化时期。法国新闻界中的右翼势力和在阿尔及利亚当过警察的法国人从各自的“阵地”向阿尔及利亚裔移民发起挑衅,引发了法国各界民众的种族主义情绪和恶劣的种族歧视行为。最令人刻骨铭心的是1961年的“十月大屠杀”。当时,法国警察对阿尔及利亚裔移民的围捕、殴打和屠杀,使法国的种族主义达到了顶点。令人忧心的是,对于“十月大屠杀”,法国社会至今并没有进行

Alec G Hargreaves, *An Emperor with No Clothes?* 载 <http://riotsfrance.ssrc.org/Hargreaves>,

参见 Patrick Simon, *French Muslims, Government Grapple With Integration Pains*, 载 <http://www.migrationinformation.org/feature/display.cfm?ID=153>.

参见 Image des Arabes, *Sondage sur l'Islam en France*, 载法国《世界报》,1989年11月30日。

认真的反思,种族主义仍在法国社会中阴魂不散。

第三,法国经济长期低迷不振和极右翼“国民阵线党”(FN)兴风作浪,是产生反穆斯林移民情绪的社会原因。1972年,种族主义分子勒庞创立了“国民阵线党”。为了在法国大选中赢得选票,20世纪80年代初勒庞便将矛头指向外来移民。勒庞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说外来移民加剧了法国的失业状况和犯罪率,增加了法国人的不安全感,对法国的价值观构成了“威胁”,是法国社会的痼疾。勒庞的这种论调,植根于法国根深蒂固的排外主义。历史上,外国移民初到法国时期,由于不能享受法国公民的劳动保护和基本权利,他们时常因被认为来抢“饭碗”而受到法国同行的排挤、驱赶和骚扰。当经济危机和失业严重时,法国工人与外来劳工的对立就会愈加尖锐,甚至会导致流血冲突。1893年8月,在法国南部埃格莫尔特的盐场,法国工人与意大利劳工之间曾发生大规模械斗,一度影响到两国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法国出现了长期的经济萧条和失业问题。外来移民,特别是北非穆斯林移民成为经济衰退的替罪羊。1979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回答“什么方式最有助于解决失业问题”时,有44%的人认为应该遣返移民,高于其他方式的支持率(在公共事业中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占40%,削减工作时间和工资占33%,增加购买力占24%,降低企业的社会性税收占14%)。

法国日益加剧的失业率、社会排斥和种族关系紧张使国民阵线党吸引了许多追随者,特别是原来支持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蓝领工人。1988—1995年间,社会党的工人支持率从42%降至21%,而国民阵线党的则从16%上升到27%。1995年法国总统大选时,勒庞在一些地区竟获得了高达20%的选票。更有甚者,2002年法国总统大选时,勒庞在第一轮投票中竟击败了社会党,得票数仅次于属于传统右翼的竞选人希拉克,令国际社会哗然。显然,“该党的意识形态影响力是巨大的,因为三个拥有投票权的法国人中就有一个赞同勒庞的一些观点,换言之,就是要驱逐境内的全部阿拉伯人”。当然,法国社会对国内伊斯兰教的关切也是国民阵线党声势得以壮大的重要原因。勒庞和国民阵线党的种族主义言论在法国社会中掀起的波澜非同小可,它为法国社会的反穆斯林情绪提供了“养分”。同时,法国的主要政党也不不得不在其政治活动中打“移民牌”,致使法国当局加快了对移民政策的修订。

第四,法国当局对穆斯林移民的歧视性政策,助长了国内的反穆斯林情绪;与此同时,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恐怖活动则为法国当局提供了口实。

20世纪70年代始,北非穆斯林移民不再享有任何入境优待,并遭到严格的审查乃至排斥。法国当局经常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大量地拘捕和遣返穆斯林移民。同时,由1989年事件引发的“头巾之争”亦导致了伊斯兰激进分子与法国当局的对立。他们在法国制造了不少恐怖活动。1994年圣诞前夕,4名阿尔及利亚籍的伊斯兰武装分子劫持了一架法国客机,最后降落在马赛。法国当局不得不动用特种部队发动突袭,击毙了劫机分子。作为报复,“伊斯兰武装团”(GIA)杀害了4名天主教牧师。1995年7月至9月间发生的一系列暴力事件,致使35名法国人死亡,200多人受伤。这些事件被怀疑是由“伊斯兰武装团”参与和制造的。

参见张庆海:《阿尔及利亚战争前后的法国种族主义——以阿尔及利亚移民在法国社会地位的变化为例》,载《世界民族》,2003年第1期,第11—20页。

参见 Letitia Creamean, “Membership of Foreigners: Algerians in France”, in *Arab Studies Quarterly*, Winter 1996, vol 18 Issue 1, 附录 3。

Rachid Tlemçani, “Islam in France: the French Have Themselves to Blame”, in *The Middle East Quarterly*, March 1997.

由于媒体的不实报道和过分渲染,1994年劫机事件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简直就成了法国穆斯林的代名词,国内穆斯林的存在被视为一种威胁。“莫名的恐惧支配着很多法国人的思想与行动。”从1993年11月9日开始,接着又在1994和1995年反复进行的搜捕中,法国警察拘捕了大量所谓的“伊斯兰拯救阵线”(FIS)的支持者和普通的阿尔及利亚人,怀疑他们是潜在的恐怖分子。1995年发生暴力事件后,法国政府动员了4万名警力,其中包括5000余名士兵,在全国进行安全检查。如同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一样,全法国共发生了两百万起基于肤色和长相的个人身份检查,具有北非穆斯林移民背景的人首当其冲。“9·11事件后,法国当局更是强化了对境内穆斯林的管制,警察被授予更多的权力,有权监视可疑分子的邮件和通信。法国当局的歧视政策助长了国内业已存在的社会歧视与偏见。

然而,多年来左翼和右翼的政治家们却不肯承认法国存在着种族主义,他们一再辩解,认为法国1958年宪法和1972年制定的法律已经明文禁止种族歧视,在法国社会中已经不可能发生种族歧视行为。事实上,法国的种族歧视并不是法律层面上的,而是行政、经济和社会层面上的。正是这样的种族主义,导致了第二代穆斯林移民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在对2005年骚乱的反思中,法国学者埃里克·马塞写道:“我认为,最关键的因素,也是法国所特有的,是全欧最高的移民青年失业率、种族歧视、少数族裔居住区的扩大与孤立,以及对其青年恶意的描绘。具体来说,移民青年已被视为法国社会的陌生人,并且日益被视为一种不断扩大的威胁。其过程是这样的:首先这些青年被视为小偷,接着又被当作一伙强奸犯,在头巾问题争论中,又成为(其姐妹的)压迫者,最后被认为是社会的渣滓,应当被清除。这样,移民青年已经无法忍受了。”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孤立的突发事件往往会引发穆斯林移民青年的群体骚乱了。

法国社会对第二代穆斯林移民日益严重的歧视与偏见,还会把他们推向法国社会的对立面。上述阿尔及利亚裔青年为什么堕落成极端分子?法国《世界报》在他死后不久刊发的一篇采访中做出了很好的回答。这是一位研究法国种族冲突的德国学者于1992年对这位穆斯林青年的采访。在采访中,这位穆斯林青年抱怨,法国给予他的生存机会远远少于其他法国孩子,结果是他由偷窃发展到吸毒,最终选择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他向采访者坦言:“我既不是阿拉伯人,也不是法国人,而是一名穆斯林。当走进清真寺时,我如释重负。他们握着我的手,他们对我犹如对待一位老朋友。当我走在大街上遇见另一位穆斯林时,没有猜疑,没有偏见。他笑了,我们都停下来,谈了起来。虽然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面,却感觉到像兄弟一样亲切。”

综上所述,法国政府坚持以“共和模式”促使穆斯林移民融入法国社会的政策面临着诸多问题。历史上,法国人曾成功地将大量的比利时人、德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波兰人、葡萄牙人甚至犹太人都很好地融入到法国社会,然而对于穆斯林移民,自阿尔及利亚战争以来,“伴随着优越与耻辱相互交错的复杂感情,法国人一直苦恼着”。法国当局以自身价值观观

参见 Letitia Creanean, “Membership of Foreigners: Algerians in France”, in *Arab Studies Quarterly*, Winter 1996, vol 18 Issue 1, pp. 59 - 61.

法国《世界报》,2005年11月7日。

法国《世界报》,1995年10月7日。

Jocelyne Cesari, “Islam in France: The Shaping of a Religious Minority”, in Yvonne Haddad - Yazbek (ed), *Muslims in the West, from Sojourners to Citize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36.

造伊斯兰教的努力至今仍未取得明显的效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适得其反。比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所遭受的暴力活动,“好像是1992年以来阿尔及利亚内战的延伸,事实上,法国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如同法国的高失业率一样,不是从阿尔及利亚输入的。在很大程度上,它是法国的北非政策,特别是数十年来(针对北非穆斯林)移民政策的产物”。在“头巾之争”中,对于许多穆斯林女孩及其父母而言,佩带头巾不是“张扬性的宗教标志,而是对她们遭到“排斥和边缘化”的消极抵抗。

在法国穆斯林中,第一代移民最初只想在法国多挣一些钱,然后回到祖国。虽然后来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选择留在法国,但他们对于成为曾经统治过自己的这个国家的公民从来就没有兴趣。如果说第一代移民由于近代以来长期遭受殖民统治而形成了执着的宗教信仰和族裔认同的话,那么第二代移民由于受到法国文化的熏陶,他们的伊斯兰意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些“新穆斯林”正在将“伊斯兰教世俗化,就像天主教徒曾将天主教世俗化一样”;对于他们来说,伊斯兰是一种“文化或民族的认同,而与繁琐的宗教仪式和活动则渐行渐远。法国的伊斯兰教是和平的伊斯兰教。这一点,正是法国穆斯林走向融入法国社会的重要特征。不幸的是,许多法国人却错误地将和平的伊斯兰教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相联系。

可见,导致法国人“苦恼”的,正是其自身。一个崇尚文化多样性的国家,怎么能够在自己的教育和人才结构中拒绝接受种族和宗教的多元性?一个主张博爱的国家,怎么能够一次次地把“绝望”的移民青年“丢给”警察,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他们所面临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一个强烈谴责种族主义的国家,怎么能够犹如“穿着新衣的皇帝”一样拒绝解决国内的种族歧视与偏见呢?法国的“共和模式”到了应该与时俱进的时候了。因此,如果只把法国发生的事件看作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的法国版的话,就很难反映法国穆斯林移民政策的全貌。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mass immigrations of Muslims from north Africa into France since 1960's. The French government upheld an immigration policy marked by the "republican pattern" which spurred the Muslim immigrants to be integrated with the French society completely. This "republican pattern" became a "bottleneck" in the integration of Muslim immigrants in the French society due to the constant "tangles" with religious activities and customs of Muslims; It is even facing bankruptcy because of the discrimination and bias against Muslim immigrants and their descendants by the French society. The French "republican pattern" and the immigration policy towards Muslims should be improved in the new situation.

(魏秀春, 讲师, 临沂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 临沂, 276005)

责任编辑: 吴家多]

Rachid Tlemçani, "Islam in France: The French Have Themselves to Blame", in *The Middle East Quarterly*, March 1997.

参见 Rachid Tlemçani, "Islam in France: The French Have Themselves to Blame", in *The Middle East Quarterly*, March 1997.

参见 Jocelyne Cesari, "Islam in France: The Shaping of a Religious Minority", in *Muslims in the West, from Sojourners to Citizens*, p. 37.